

《尧山堂外纪》在朝鲜的传播与影响

王国彪

《尧山堂外纪》^①是明人蒋一葵的笔记体著作,万历三十四年(1606)刊行。由于缺乏确切的史料,《尧山堂外纪》传入朝鲜的具体时间及途径等细节尚不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这部书至迟在万历四十二年(朝鲜朝光海君七年,1614)就已经传入朝鲜。这一年,朝鲜学者李睟光编撰的大型类书《芝峰类说》^②刊刻印行,共20卷3435条,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著作,其中39个条目引用了《尧山堂外纪》。

中朝两国在壬辰战争(1592-1598)后政治、文化关系异常亲密,朝鲜对大明(天朝)代表的中华文化求之若渴。虽然后世学者认为“是书取记传所载轶闻琐事,择其稍僻者,辑为一编。上起古初,下迄明代,每代俱以人名标目。雅俗并陈,真伪并列,殊乏简汰之功”^③,不过在当时朝鲜人看来,《尧山堂外纪》采用了类似“纪传体”的编写体例,记录了很多他们不熟悉的中华文化要素,因此这部由明朝学者编纂的著作当然值得参考和信赖。于是,《尧山堂外纪》在朝鲜半岛广为流传,不仅有诸多刻本和抄本^④,而且被朝鲜古代文集、类书、史书多次引用,在中朝文化交流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一、朝鲜汉文文献对《尧山堂外纪》的引用情况

根据目前搜集到的资料统计,朝鲜古代文集、类书、史书引用《尧山堂外纪》近60处。其中,李睟光《芝峰类说》引用《尧山堂外纪》的引用时间最早、次数最多(39条41处),涉及文学、科举、外交等多个领域,产生的影响也最

①本文所引《尧山堂外纪》为《续修四库全书》第1194、119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影印万历三十四年刻本)。

②本文所引《芝峰类说》(《朝鲜群书大系》续第21、22辑)为朝鲜古书刊行会1915年铅印版。

③永瑆等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第25册,商务印书馆,1931年,第87页。

④据笔者检索,韩国各大藏书机构现藏有《尧山堂外纪》的刻本、抄本至少60余种,其中刻本(木版本)不到10种,抄本题名多作《尧山堂记》或《尧山堂记抄》,大多数不分卷,有选择地节录了刻本的部分内容,偶有错漏。

大。随后,李瀾《星湖僊说》、洪大容《桂坊日记》、尹愔《峡里闲话》、李德懋《盎叶记》、丁若镛《钦钦新书》、韩致斋《海东绎史》、李圭景《五洲衍文长笺散稿》、徐庆淳《梦经堂日史》等文献中也都引用了《尧山堂外纪》。从引用数量、效果等方面来看,朝鲜文人很重视《尧山堂外纪》这部笔记体著作,书的文献价值、诗话意义也借此得以凸显。

(一) 治国经验的借鉴

《尧山堂外纪》记录了中国历代很多治乱兴衰的事例,朝鲜君臣将其视为治国安邦的一部工具书,文人也以之作为指点江山、抒发个人政治见解的论据。

徐宗泰《札记录》曰:“按《尧山堂记》注:皇朝毅皇帝自立称号、巡游无度之事,多有正史不载者。当时若非一二大臣匡救之功,则吾恐觊觎而起者不特宸濠之宗戚而已。社稷之不亡,幸耳!”^①他引用《尧山堂外纪》卷九十四“毅皇帝”(正德)、“宁庶人”二条目的注解,借“正史不载”之事抒发了自己对明朝兴亡的诸多感慨。

朝鲜实学派人物洪大容的《桂坊日记》记载,1775年正月的一次宫廷书筵上,至兼司书洪国荣“以《尧山堂记》进谏事”,并言:“臣见《尧山堂记》尚在座右,恶在其开纳也?”^②文中未言及洪所谏何事,但是从朝鲜国王身边放置《尧山堂记》的描述来看,这部书对朝鲜朝的政治生活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尹愔《峡里闲话》引《尧山堂外纪》“东坡妾先孕后嫁孙氏而生孙觐”这条记录,并借此记录严厉批评了当时朝鲜社会存在的门第观念:“盖古则专用人材,不拘世类。故若范仲淹、杜荀鹤、孙觐者,不害为名世之人。若我国用人则专取门地,小不燁赫则已欲摈弃。况此三人者,必皆为疵累无用之人,而曾不齿之伦矣,安得为尚书、翰林?又安得齐名位于韩富诸公哉?”^③

《尧山堂外纪》为这些政治见解提供了具体的语境和严密的逻辑,并成为可靠的论据,有力地支撑了文人的论点。

(二) 学术考证的依据

朝鲜朝中后期实学思想兴起,在社会改革、学术等诸多领域提倡实事求是的精神。很多实学派文人以《尧山堂外纪》作为学术考证的依据,从而推进了学术研究。

学者李德懋在《盎叶记》中探讨了明人袁忠彻(1377-1459,字公达)的

①徐宗泰:《晚静堂集》,《韩国文集丛刊》第163辑,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6年,第248页。

②洪大容:《湛轩书》,《韩国文集丛刊》第248辑,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2000年,第51页。

③尹愔:《无名子集》,《韩国文集丛刊》第256辑,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2000年,第527页。

《符台外集》，肯定了书中关于元顺帝身世、命运的记述。他首先引用《尧山堂外纪》卷七十四“顺帝妥欢帖睦尔”条下注，载述元顺帝为瀛国公（宋少帝显）之子事，经过比较后指出《外纪》的这段记述引自《符台外集》。其曰：“予以为虽不见《符台外集》，然《外纪》所引必是此集（案，《外纪》所引极博而不书书名）。忠彻仕于永乐间，目见元亡，其言恐不虚。”^①李德懋之孙李圭景的类书《五洲衍文长笺散稿》中有《二十三代史及东国正史辨证说》一文，其中也提及《盎叶记》引用了《尧山堂外纪》一事。

实学家丁若镛在法律著作《钦钦新书》中抄录了中国古代很多断案案例，结集为《批详雋抄》，其中有“苏按院淫僧决词，壁书发奸”条，并在条后下按语曰：“此本东坡所决（见上篇），《踏莎行》明亦东坡所字（见《尧山堂记》）。”^②苏轼以《踏莎行》词判灵隐寺僧了然杀妓李秀奴事，相继载于宋代笔记《醉翁谈录》和《绿窗新语》。“苏轼《东坡乐府》未见有此词，很可能是托名。余象斗《廉明公案》上卷‘人命类’《苏按院词判奸僧》即据以演绎，……判词‘臂间刺道苦相思’亦改为‘壁间刺道苦相思’。”^③根据此条花判及判前的案情简述，丁若镛的记述应抄自《廉明公案》（全名《皇明诸司廉明奇判公案》）。丁若镛还引用《尧山堂外纪》卷五十二“苏洵”条的相关内容以按语的形式考证了判词，认为那是苏轼的作品。丁若镛生活的时代，苏东坡的作品传入朝鲜已经有四五百年，他作为一个大学问家不可能不知道，但是他引用《尧山堂外纪》来考证判词，说明其对这部书较为信任。

另外，韩致雍《海东绎史》的“引用书目”就包括《尧山堂外纪》，其卷二十九《宫室志》“酒具条”、卷三十六《交聘志》“高丽”条中，俱引“元丰中，高丽献紫霞杯”一事，从一个具体角度展现了中朝两国（北宋、高丽）特定时期的友好关系。

（三）增强文学表现力

朝鲜很多文人在抒情、记事时都能恰当引用《尧山堂外纪》，以此来增强文章的感染力，丰富文章韵味。

金时观在祭文中这样写道：“应天寺、云住庵，皆汝肄业之所，而有时足到，汝之遗躅若可接也。李杜诗、《尧山堂记》，皆汝手笔所誉，而寻常目触，汝之精神如可掬也。”（《祭亡儿炼行文》）^④《尧山堂外纪》在文中成为老父伤悼亡子

①李德懋：《青庄馆全书》，《韩国文集丛刊》第259辑，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2000年，第5页。

②丁若镛：《与犹堂全书》，《韩国文集丛刊》第286辑，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2002年，第56页。

③石昌渝：《明代公案小说：类型与源流》，《文学遗产》2006年第3期，第116页。

④金时观：《节谷集》，《韩国文集丛刊（续）》第61辑，韩国古典编译院，2008年，第195页。

的重要媒介,睹物思人,深沉的悲痛渗透在字里行间。

咸丰年间,朝鲜使臣徐庆淳出使中国,著有《燕行日记》《梦经堂日史》,其中两度引用了《尧山堂外纪》。路过丰润县榛子店附近,他引用《尧山堂外纪》所载郝经《巴陵女子行》,抒发了对宋代女子韩希孟、清代女子季文兰的同情和赞美:“夫文兰所遇,与希孟无异,而希孟之洁身,发于吟咏,其节可尚。”(《五花沿笔》)^①在北京,他游览白塔寺,“下塔过广渠门。从者曰:‘万柳堂在广渠门内东南角。’余欲往见,从者曰:‘日已向暮,恐值门限。’余叹曰:‘何不早教我登览此堂耶?’”(《紫禁琐述》)^②随后,他在日记中引用《尧山堂外纪》卷七十赵松雪即席赋诗“万柳堂前数亩池,平铺云锦盖涟漪。……谁知咫尺京城外,便有无穷万里思”的故事,描绘了自己对万柳堂及古人风雅的向往之情,从而使这篇日记增添了很多文学风韵。

(四) 阐发诗学思想

由于《尧山堂外纪》记载了很多诗歌评论,所以朝鲜文人往往将其视为一部诗话来引用,李晔光的《芝峰类说》就是最好的代表。这部类书有39个条目引用了《尧山堂外纪》,而诗歌就占了30条,包括汉诗1条、南朝诗3条、唐诗5条、宋诗5条、明诗11条、朝鲜诗5条,大多数为诗评。李晔光是朝鲜朝著名的诗论家,“芝峰之诗话,一言以蔽之:‘强调唐诗’。”^③《芝峰类说》集中反映了当时“尊唐贬宋”大背景下朝鲜诗人“尊唐”的相关立场和观点。从诗话学的意义上看,《尧山堂外纪》对李晔光“尊唐”诗论的形成具有重要的作用。

《芝峰类说》卷十二“明诗”条载:“洪武中,钱宰赋诗曰:‘晓鼓冬冬起着衣,午门朝见尚嫌迟。何时得遂田园乐,睡到人间饭熟时。’太祖见之曰:‘朕未尝“嫌”尔,何不着“忧”字?’仍放还田里。余谓此诗甚有味,令人隽永无已,然语似太露。不如欧阳公‘十年骑马听朝鸡’之句,意圆而无迹矣。”^④《尧山堂外纪》卷七十九载此事,后世征引时往往侧重描述当时的特务制度。而李晔光则以之论诗,他认为钱宰的诗有“诗味”,是一首很好的诗,美中不足的是不够含蓄,影响了意境的营造,这充分体现了李晔光论诗“尊唐”的一面。

《芝峰类说》卷十三“东诗”(朝鲜汉诗)条载:“世传郑知常诗曰:‘三丁烛尽天将晓,八角章成桂已香。落月满庭人扰扰,不知谁是壮元郎。’余按,‘三丁’犹言‘三条’,今奉常寺祭烛,以一柄为一丁,以三柄为三丁。‘八角’,即律赋以八韵为押作八角也。按《尧山堂外纪》曰:‘唐制,举人试日既暮,许烧烛三条。故韦承贻诗曰:“三条烛尽钟初动,九转丹成鼎未开。残月渐低人扰扰,不知谁是谪仙才。”’郑知常是朝鲜高丽时期著名诗人,诗多散

①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94册,韩国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第289页。

②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94册,第399-400页。

③赵钟业:《中韩日诗话比较研究》,学海出版社,1984年,第245页。

④《芝峰类说》(下),第59页。

⑤《芝峰类说》(下),第66页。

佚。李晔光注郑诗,引《尧山堂外纪》卷三十“权德舆”条作为论据。通过征引《尧山堂外纪》,李晔光不仅解释了“三丁”、“八角”这两个生僻词语,帮助人们读懂了诗作,还顺势指出了此诗末联对唐人韦承贻七绝《策试夜潜纪长句于都堂西南隅》的借鉴。

《芝峰类说》卷十四“闺秀”条载:“陈女沈满愿《咏残灯》诗云:‘残灯犹未灭,将尽更扬辉。惟馀一两焰,犹得解罗衣。’韦应物亦有《残灯诗》云:‘独照碧窗久,欲随寒烬灭。幽人将遽眠,解带翻成结。’《尧山堂纪》以为‘韦诗实出于沈’。余谓韦诗别无蹈袭,岂可言出于沈耶?且沈诗,或谓纪少瑜作也。”^①李晔光不认同“韦诗实出于沈”的观点,理由是“韦诗别无蹈袭”。从诗歌本身看,沈诗更像一首咏物诗,突出了由残灯生发的对自然、人生的思考,也写出了夜深人不寐的淡淡哀伤,而韦诗则更像一首闺怨诗,残灯只是相思场景中的一件重要道具,末句更写出了幽人的相思之苦,显然属于“韦苏州体”,所以李晔光的观点比较可靠。另外,李晔光还指出,有人认为《咏残灯》诗的作者是纪少瑜,从文献的角度进一步否定了《尧山堂外纪》的观点——作者尚不明确,何谈蹈袭?

另外,考察引用《尧山堂外纪》的情况,还可以发现朝鲜早期著名诗话《白云小说》现存版本中的一处明显错误,这为朝鲜古典诗话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话题。

高丽时期著名文人李奎报(1168-1241)著有诗话《白云小说》,原书已散佚,洪万宗的《诗话丛林》(1712年成书)辑抄了部分内容。《诗话丛林》本《白云小说》第一则诗话写道:“我东方自殷太师东封,文献始起,而中间作者世远不可闻。《尧山堂外纪》备记乙支文德事,且载其《遗隋将于仲文》五言四句,诗曰:‘神策究天文,妙算穷地理。战胜功既高,知足愿云止。’句法奇古,无绮丽雕饰之习,岂后世委靡者所可企及哉?按:乙支文德,高句丽大臣也。”^②乙支文德是高句丽名将,曾赠诗给隋将于仲文,朝鲜文人一般称此诗为《遗于仲文》或《遗隋将于仲文》。《隋书》卷六十“于仲文传”详载乙支文德赠诗一事,朝鲜王朝(1392-1910)编纂的《东文选》^③卷十九载此诗,题为《赠隋右翊卫大将军于仲文》。《芝峰类说》卷十三“东诗”条其一载:“《尧山堂外纪》备记乙支文德事,且载其与隋将诗曰:‘神策究天文,妙算穷地理。战胜功既高,知足愿云止。’其词近古。”^④乙支文德这首诗是朝鲜古代汉诗的早期佳作之一,在朝鲜汉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李晔光指出了该诗在文辞、技法、意境方面的成就,“其词近古”的评语甚为恰切。

①《芝峰类说》(下),第103页。

②洪万宗:《洪万宗全集》(下),太学社,1986年,第344-345页。

③《东文选》成书于成化十四年(1478,朝鲜成宗九年),是李氏朝鲜(1392-1910)初期一部专选本国诗文的总集,作品选录工作主要由学者徐居正(1420-1488)完成。

④《芝峰类说》(下),第65页。

通过对比可以看出,二者的诗本事和诗评都非常相似。从生卒年代来看,李奎报早于李晔光 400 余年,理应是李晔光沿袭了《白云小说》的观点,但是这里出现了一个“关公战秦琼”式的错误:《尧山堂外纪》成书于明代,李奎报绝不可能引用后人的观点。因此可以肯定,洪万宗辑录的《白云小说》的这一则记载存在着错误。从现有的情况看,有两种可能:第一,这则记载是窜入之作,真正作者是洪万宗,而不是李奎报;第二,原作者是李奎报,而关于《尧山堂外纪》的内容是抄写者洪万宗借鉴李晔光的观点后加上去的,而且又没有特别说明。因此,关于这则诗话内容、作者方面的疑问,我们期待着学术界的努力和新证据的出现。

二、对《尧山堂外纪》缺憾之处的探讨

《尧山堂外纪》虽不是一部十分重要的诗论作品,但它出于明人之手,在尊大明正朔、崇奉中华文化的朝鲜朝,自然就是一部重要著作,不会被轻易臧否。朝鲜文人大量引用之,是为赞扬;同时,朝鲜文人在使用这部文献的过程中也逐渐发出了一些批评和质疑的声音,其主要观点与《四库全书总目》的“雅俗并陈,真伪并列,殊乏简汰之功”基本吻合。如李德懋在《盎叶记》中指出:“《外纪》所引极博而不书书名。”当今学者也指出:“《尧山堂外纪》在文献价值上的最大遗憾,是其抄文不注出处,为后来的查校、研究带来极大的不便。”^①是为确论。

朱熹有诗曰:“葱汤麦饭两相宜,葱养丹田麦疗饥。莫谓此中滋味薄,前村犹有未炊时。”^②关于朱熹此诗的诗题、内容及流传过程有多个版本^③,目前尚无定论,俗称《葱汤麦饭歌》。李晔光认为此诗“当食而先念未炊之人,可见仁人君子之用心也。”^④实学家李翼的《星湖僿说》卷二十六“经史门”以“晦翁访婿”为题进行了讨论:“按《朱子行状》,女五人:儒林郎、静江府临桂县令刘学古,奉议郎、主管亳州明道宫黄幹,进士范元裕,有二女早卒。岂更有女作蔡妻

①张震育:《〈尧山堂外纪〉戏曲小说资料考察》,《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第71页。

②褚人获:《坚瓠集》,《笔记小说大观》(七),广陵书社,1984年,第95页。

③褚人获《坚瓠集》三集卷三以“葱汤麦饭”为题,认为这是朱熹写给女儿(蔡沈的妻子)的诗作,而江西龙南烛溪《孙氏族谱》则将此诗题作《访孙季和于烛湖咏麦饭》(朱熹写给孙应时),现在一些地方掌故也将此诗称为《示女儿诗》(如宁德市政协编《闽东历史名人》,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22页),还有一些研究将此诗看作朱熹以民为念的证据(如方利山《大儒新安朱夫子》,《徽州学散论·续集》,中国戏剧出版社,2009年,第58页);朱玉《朱子文集大全类编·补遗》及厉鹗《宋诗纪事》中则题作《德兴县叶元恺家题》(朱熹写给叶元恺),诗句也略有不同:“葱汤麦饭两相宜,葱暖丹田麦疗饥。莫道儒家风味薄,隔邻犹有未炊时。”

④《芝峰类说(下)》,第56页。

⑤李翼著,李佑成编:《星湖全书》(六),骊江出版社,1984年,第971-972页。

耶?中国之人而鲁莽若是。”^⑤他批评中国人缺乏考证、鲁莽下笔。而学者洪奭周在《抄启故实》中进一步批判:“臣于朱夫子《全书》奉之若拱璧,信之如神明,而独于《遗集》一卷往往有不能无疑处。……《七夕》一词明载于唐人集中,而《联珠诗格》以为先生所作。蔡沈之非先生女婿,可以征信于《行状》,而《尧山堂记》乃载《葱汤麦饭》之诗。此二书者,皆近于稗官不经之谈,而亦未免混载于《遗集》,则《遗集》之难以尽信亦可知矣。”(《朱子大全·语类仰质十一条》其十)^①他认为混杂了《葱汤麦饭歌》之类诗作的《朱子遗集》令人难以尽信,而载此诗的《尧山堂外纪》则近于稗官之言,荒诞不经。

李圭景《五洲衍文长笺散稿》也对《尧山堂外纪》记载的一些轶闻提出了批评。《天定有征辨证说》一文引《尧山堂外纪》:“元始祖曾问历数于术士。对曰:‘千秋万岁不足虞,惟日月并行乃可忧耳。’”^②李圭景认为“……无异图讖,而事后方验矣。何异于轨革卦影者乎?”^③《飞鱼辨证说》一文引宁封子“千载暂死食飞鱼”之句,李圭景批之曰:“……似影响之谈,何异空谈龙肉?”^④他认为这些记载没有任何积极的现实意义,只是满足人们的猎奇心理而已。

可见,尊崇儒家正统观念的朝鲜文人并非全盘接受这部文献,他们认真地甄别、取舍,并对《尧山堂外纪》的缺憾进行了批评,表现出独到的认识。

总之,《尧山堂外纪》在特殊的时代、文化背景下传入朝鲜半岛,在那里广泛流传并产生了较为重要的影响。朝鲜文学、政治、历史等领域的文献也不同程度地从这部笔记体著作汲取了营养。《尧山堂外纪》在朝鲜的传播,扩大了中华典籍的影响,促进了朝鲜的文化发展,是当时中朝两国文化交流繁荣局面的一个缩影。

作者工作单位: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

①洪奭周:《渊泉集》,《韩国文集丛刊》第293辑,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2002年,第338页。

②李圭景:《五洲衍文长笺散稿》(下),明文堂,1982年,第375页。

③李圭景:《五洲衍文长笺散稿》(下),第375页。

④李圭景:《五洲衍文长笺散稿》(下),第587页。